

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人自述

陈夏红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法意

法意阑珊处

——20世纪中国法律人自述

陈夏红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十六篇忆述之作。作者中不乏二十世纪中国的顶级学人。书中通过自述所映现的人事、所展示的世相，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大变局。本书所取文字，便是观察近代以来中国法政人所为、所欲、所思、所想、所学、所感的载体。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人自述/陈夏红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
(法意)
ISBN 978-7-302-19095-0

Ⅰ.法…　Ⅱ.陈…　Ⅲ.法学家－评传－中国－20世纪　Ⅳ.K82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6549号

责任编辑：方　洁　王荣静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装 订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230　　**印张**：18.25　　**字数**：246千字
版　　次：2009年2月第1版　　**印次**：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
定　　价：.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转3103　产品编号：

序

学人自述，叙身世、理学思之外，不免感喟世道人心。暮岁回首，曾经的惊心动魄，早成书页上静静的历史，原不脱常识；似乎云谲波诡的，尽付与雨井烟垣，使后人复哀后人而已。因而，研墨拈笔，所述所议，心中丘壑也好，家国情仇也罢，一己心路照映的，一时代的人事与世相矣。

法政学者因为治学对象关系，这世道人心遂常常牵扯到政道和治道，字里行间便多了一份不忍之心。政道无他，一时代一民族打理公共生活的原理和原则，关于政治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攘让取舍之道；治道有常，将政道落实为体制化安排，就今日人间秩序而言，一般即为一种法权安排。政道不彰，天人淆乱，原是人世常态；治道雍蔽，贪渎横行，更且无日无之。几番风雨，一派萧瑟，终至人头滚滚，于是不得不另起炉灶，好一顿折腾。因而，法学家下笔惊心，情怀难抑，法意苍茫，凡心肠还在，怎能不充盈不忍呢?!

眼前这册文字，度集了十六篇忆述之作。作者齿德接续，恰成三代，不乏二十世纪中国的顶级学人。合其忆叙，堪为一个时代法学家的群体肖像，正为此不忍之心的范本，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法意苍茫的

写照。这三代学人，构成了中国现代法学的先驱。生于忧患，长于危难，是他们共同的人生轨迹；振弊起衰，救国建国，为中华之复兴而上下求索，是他们念兹在兹的毕生奋斗；秉持自由立场，挈领批判精神，将浩然志业尽付于孜孜矻矻的书生事业，虽九死其犹未悔，恰为其心路历程。赶上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有的劫后余生，乘桴浮于海，如萧公权先生、张君劢先生，偷生异域，得免再度浩劫，暮鼓晨钟里，夕惕朝乾，完成了一己学思；有的花果飘零，四方流徙，若涉渊冰，最后寄身海疆，如吴经熊先生，将中国文明法学智慧更做一番演绎，幸而为中华民族保留下一颗读书种子。更多的人，如钱端升先生、杨兆龙先生、周枏先生，不幸遭临时代的腥风血雨，一生颠沛，身心均受摧残，甚至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惨烈如杨兆龙先生，批斗劳改，戮心戮身，千般煎熬中，油尽灯灭，连最后说话的机会也随同躯体一起湮灭于浩劫。论其学，或未臻圆融，时有不彰，但现代中国的法意，迁延不息，一脉流转，恰因为他们用性命托付；论其人，或不免跑龙套而乐不自知，但人间事业，阴差阳错，丁一卯二，以迄于今，却正少不了这许许多多的无私奉献。梦终有醒时，那多半是在天光熹微之际，以长夜为代价。

执教杏坛，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共同职业。钱端升先生自谓，终其一生，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其实，这也是他们中多数人的共同人生，乱世安身的岗位，承平用世的主业。宁波德生公早年得意，中年飘泊，晚年蛰岛，抛开种种杂碎，其一生设讲著述，福音伴法意，爱生并乐生，圆而神，方以智。同出宁波的江平先生，年届八旬，依然风雨兼程，大声疾呼，不改平生，为万千法科学子标示了精神境界。至于萧公权先生，如其弟子所述，隔海江山烟雾外，销尽风流心力怠，终生执棒，死而后已。中国的法学教育至有今日的规模和层次，正赖于先驱开道，后继同心，才有此薪火不熄，而与中国文明的劫难和复兴，共其哀痛，同其始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因此，他们的自述所映现的这一时代的人事，实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纷繁歧出者；他们的自述所展示的这一时代的世相，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大变局。百年期间，中华民族自帝制政治、小农社会，以五代人的奋斗，一路扑腾，向着现代法治政体、公民社会渐行，而以富强、民主的新中国为鹄的。建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这一期许本身，即已意味着近代中国及其法学家们必须整合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同时担负起驯化强权政治和抗击帝国主义的双重任务。现代法治作为民族国家的软实力，旨在料理、服务人事，而规范、造福人世，一方面为宪政正义的公民理想提示历史文化语境，将民主政制编织于民族国家的主权空间；另一方面，它标立国家的正当性，以对于权力的合宪性配置来落实政治正义，从而实现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这一民族理想。贞元之际，法权体制与法学家们，其用在此，其志亦在此，正为此纷繁歧出的大变局中的壮丽场景，也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成为殉道者的宿命所在。因而，就学术理论和价值倾向而言，他们各奉其义，自领风骚，或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第三条道路，但是，臧谷亡羊，他们几乎全都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

换一个角度，则“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道尽了中国语境下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的一切含义。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国的人世生活才算走上正轨，中国的人生也才有其意义。就百年中国而言，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宽容，天道与人心的合德，构成了中国人心之所向，也是人生之必需，更是法之所以为法的前提，而蔚然成为一种自然之法，中国人生的意义所在。法学家是法律的良心，天职所系，命定要以此意义世界为自己的人生境界，非形诸笔墨，见诸言行，践诸体制与日用，方才死而后已。也就因此，他们讨说法，要活法，便是在讲明一种道理，阐说一种情理，梳理一个法理，主张一种公道，从而是对垒砌人间地狱的一切悖情害理、违忤公义的恶政恶法的反抗。这一切凝练为学思，累积的是以中国

的法制和法意为写照的汉语法学，特别是以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为背景的法学的历史之维；这一切呈现为道德理想，即为对于美好人世的追求，特别是对于一切以人本身为目的的人道理想的执守。从而，他们天生成为一切强权的死对头，也是这一切意义的殉难者。

朋友，书生事业，无限江山，则事业在此，海疆天宇亦在此；而吾侪所学关天意，天意即此万万千千的人心矣！

时在1977年，回首“反右”劫难，江平先生感喟，“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兵”。其实，就因为以宪政正义为核心的现代法治要求权力必须接受正当性审查，法学家们的思想传述着人世的美好向往，以不屈表明人性不死，在黑暗的岁月里发光，所以，黑暗便发抖了。如今这一册文字，也恰是纸上人生，书生的人生。

其情其景，汉娜·阿伦特早已道明。甚矣，想此时此刻，编者有心，序者无意，而万千读者诸君自有察识，当与作者同生此慨吧！兹引如下，并此作结：

>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许章润谨识

2007年10月28日于清华大学

目　　录

序 …… 许章润/ Ⅰ

教学相长 …… 萧公权/ 1
友谊的故事 …… 吴经熊/ 15
我与宪法 …… 张君劢/ 49
回顾与远瞻 …… 陈顾远/ 55
我和社会史及法制史 …… 瞿同祖/ 65
我与罗马法 …… 周　枏/ 74
不同的时代,曲折的道路 …… 钱端升/ 91
以法学为业 …… 韩德培/ 99
人到古稀温旧梦 …… 龚祥瑞/115
成我毁我皆政治 …… 王造时/124
我为党的事业竭尽自己一切力量 …… 张志让/160
为“七君子”而辩 …… 李文杰/183
东京审判 …… 倪征暾/191
杂忆留苏 …… 江　平/212
沪上法治梦 …… 何济翔/221
动荡的大学时代和牙膏皮事件 …… 陆锦碧/248

“历史三峡”中的法政人 …… 陈夏红/272
正文人名索引 …… 276

教学相长

萧公权

萧公权(1897—1981),字恭甫,号迹园,笔名巴人、石沤、君衡。江西省泰和人,幼年就读于私塾。1915年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五四运动中曾参与创办《民钟日报》。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主修政治哲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南方、国民、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光华、华西、政治等大学教授,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曾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8年秋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1949年9月离台赴美,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直至1968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康有为研究》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同织英(薛织英,萧公权爱人,编者注)在上海过了旧历丁卯岁的新年,带着女仆张妈于民国十六年二月上旬乘沪宁路和津浦路的火车启程北上。到了天津车站时叔玉已在那里等候。在他照料之下,我们雇了几辆人力车一直去到八里台南开大学的百树村三号教员住宅,很快就安顿妥当。他们夫妇带着女儿住在六号里,与我们的寓所相隔两家。文学院长黄子坚先生住四号,是我们的紧邻。

南开两年半

第二天上午黄子坚陪我去见校长张伯苓先生,并将我介绍给注册课主任伉乃如先生。伉先生名义上是注册课主任,实际上他所负的职务超出"注册"的范围。他与我商定我所授的课程:"政治学概论"、"比较政府"、"法理学"。前两门是全年的课程。徐谟先生教了上学期,我接着教下学期。"法理学"是半年的课程,本定徐先生讲授,现在由我来承乏。我第二年所授的课程是"中国政治思想"、"西洋政治思想"和"社会演化论"三门全年的课程。我每星期共授九小时的课,教师工作不算繁重。但"比较政府"、"法理学"和"社会演化论"都是我不曾教过的课程,必须从头做收集教材和组织讲稿的工作。所幸我在密苏里大学肄业时曾选修"社会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课程,对于演化论的学说略知其梗概。后来准备写硕士和博士论文时,对于政治理论和制度以及法律理论和制度,曾广泛地涉猎过。因此准备教材虽然感觉吃力,尚不至茫然无从着手。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曾在上海教过,但所用教材比较简单,并且只够一学期之用。现在所授的"政治学概论"是全年的课程,我用的教材必须与徐先生在秋季学期所用的教材相衔接,因此必须重新准备。"西洋政治思想"的教材,准备起来比较容易,但仍要用一些时间去整理。"中国政治思想"没有现成的教材,必须全部搜辑编排。这样一来,我每星期虽然只授九小时的课,所用于准备教材的时间大约五倍于此。伏案工作常要到子夜。两年半勤慎将事,总算平稳度过。我向学生所

讲述的课程不能说含有新知创见或高深学理，但自问还不至于捕风捉影，曲解臆说。

南开在那时是华北一个规模虽小而地位不低的大学。张校长得严范孙、范源廉诸先生的力助于民国八年成立南开大学。民国十七年大加充实，改文、理、商三科为文、理、商三学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十一系。同年秋天，卢木斋（靖）先生捐款十万银元建筑的木斋图书馆落成。我到校的第二年恰好躬逢其盛。张校长和华午晴、孟琴襄、伉乃如等几位干部人员，努力多年，创造了“白手兴家”的奇迹。他们脚踏实地，不骛高远。招生既从严格，开设课程也宁缺毋滥。学生专心向学，教员认真授课。教员的人数不多，但多有实学专长。我厕身其间，不敢不格外勤勉，冀图追随。《学记》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我在自己做学生时已经有了学知不足的经验，教然后知困的道理现在才能亲切地体会。“自强”照郑注的解释是“修业不敢倦”。为求不使好学的青年对我过于失望，我必须修业不倦，充实自己，弥补自己学问的漏洞。我在教，我也在学。在两年半当中，我不敢自信学问有多少长进，但确曾获得师生切磋，教学相长的益处。

我不曾变作毫无生趣的书虫。这很辛苦的两年半也是很快乐的两年半。除了读书之乐外，我还有友朋之乐。同事当中除有谊比同胞的堂兄叔玉外，还有在美国已先熟识的旧友何淬廉兄和到南开方才熟识的新知蒋廷黻、李继侗、沈仲端、姜立夫、饶树人诸兄。其余的同人也相处甚得，融洽无间。学校把百树村十号房屋的一部分作为教员俱乐部。晚饭之后，我们随意去那里喝咖啡，谈天，或作各种游艺，借以稍纾一天工作的疲劳。“集体象棋”是我们最喜欢的游艺。两人坐下对局，其余的人一哄而上，分别站在当局者的背后做义务参谋。这种集体下棋的基本教条是“观棋不语非君子”。当局者集思广益，从谏如流，尽可无为而治，维持“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风度。大约一个钟头，我们尽兴而返，回家去继续做研究工作（如廷黻兄），或

加紧预备教材(如我自己)。

可惜好景不长。民国十八年的秋初,叔玉继廷黻之后,应清华大学之聘,离津赴平。生物学教授李继侗兄不久也移讲清华。恰好沈阳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兄受文法两学院之托到平津来延聘教授,我也在被邀之列。惜冰是清华学校庚申级的老同学,我当然乐于应命。我本来也想到关外去看一看。东北大学的邀请,给我一个机会去达成这个心愿。叔玉脱离南开,可以说是不欢而散。学校当局对他的态度,不能令人满意。这增加了我脱离南开的决心。五月中学校发出下年度的聘书。除叔玉外,所有我们相熟的人都加薪十元至廿元不等。叔玉来对我说:"我在这里五年了。这回仍没加薪。我想这是他们对我示意。我不能赖在这里了。"廷黻接到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邀请,来商谈去就问题,听见叔玉被学校冷落,大为不平。他对叔玉说:"我们同去清华好了。"不久之后,清华大学经济系来信敦请叔玉。叔玉的学问专精而踏实。他在南开教书极其尽心,阐述学理,条分缕析,征引事实,翔实确当,很得学生的信仰。为什么南开当局不设法使他安心久住?这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张校长认为我们这几个人他去是因为南开的薪水给得太低。待遇不丰,诚然是事实。五口之家的同人,有时会入不敷出。然而我们谅解学校经费不宽的苦衷,平日并无怨言。我不能接受张校长的解释。

东北大学印象

民国十八年九月初我们离开天津的时候,庆熙刚满两岁,庆华还未满两月。幸好有忠心而得力的张妈和曾在侨居天津薛家服务多年的男仆老胡,伴着我们大小四口,坐上平奉路的火车出关北去。那是一个颇有秋意的阴天。一个曾在我班上听讲的学生马奉琛,探知我们起程的时日,独自到车站来送别,并帮着照料一切。热肠古道,十分可感。

东北大学是一个成立未久的学校。建筑尚属壮丽,内容却有待

充实。校园靠近北陵(清太宗昭陵)。共设文、法、工三个学院。教员住宅是用水泥和火砖建筑的西式平房,颇为舒适。学校对从关内请去的教授颇为优待。名流如章行严、傅治芗、梁漱溟等也在校中讲学。清华同学陈钦仁、孙国华、张忠绂、梁思成等先后来东北任教。国华兄嫂是我们的紧邻,几乎每天见面,不时互相往来。我授课不多,只教"政治学"和"西洋政治思想"两门,每星期共六小时,颇有余暇,约同小孟诸兄到松柏参天、气象宏伟的昭陵去散步,到"日本地"去观察强邻政治经济侵略的现状,到沈阳城内的商店去购买用品食物或饭馆去便餐,城内"杏花村"的糖醋脆皮黄鱼,味尤隽绝,堪称关内外第一。东北学生的程度与上海"野鸡大学"的学生相比,可以说是难分轩轾。他们似乎还能用心听讲,对我也尚有好感,孙国华兄和我班上的学生,知道我们于学年结束后即将离校,曾举行一个餐会,表示惜别之意。

张学良是东北大学校长,但学校的行政实际上由副校长总揽。工学院长高惜冰是学纺织工程的留美学生,可以说是"内行"。文学院和法学院两位院长的政治色彩似乎比较浓厚。整个大学好像都带着一点官府的气息。如果我们说南开办事的效率过高,我们只好说东北行政的效率太低。举一件小事为例:我在天津动身以前曾电知法学院长臧启芳先生我到校的日期。到校的那天我到法学院和总务处的办公室去接洽,都不得要领。最妙的是,当我说明来历并表示想见院长时,一个职员说:"拿名片来。"我把名片递给他,一看上面只印有我的姓名,并无显赫的头衔,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说:"院长不见。"最后我到工学院找着了惜冰兄,经他派员陪着我去见了法学院长,一切问题才迅速而顺利地解决了(照张忠绂兄所著自传《迷惘集》中所记他在东北大学所遭逢的一切看来,我比他幸运多了)。

开学不久,校长设宴款待新到的教授,约请各院长、系主任和一部分旧教授作陪。这是一个场面不小的宴会。张学良和他的夫人于凤至都在座。

燕京忆旧

民国十九年春天，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徐淑希兄欧游定毕，假道苏联，经沈阳回北平。他听说我在东北大学，特地来看我，当面约我下学年去燕大任教。我本来打算在东北只教一年。淑希兄的盛意，我当然乐于领受。

燕京是一个教会所办的大学，与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陵、济南的齐鲁、成都的华西等校性质相同，地位略等。我曾在教会中学肄业，现在到教会大学教书，这或者可以说我虽不信教而与教会有缘。燕京的校长是前清翰林吴雷川先生，行政实权操于副校长——在中国生长美籍传教士司徒雷登先生。燕京虽是教会所办，招收学生、聘请教员，并不限于基督徒。学生来自国内各省以及海外各地。教员有不少是外国人。因此校内的"洋味"远比南开、东北重。有些学生尤其是来自海外的学生家境富裕，男生固少穷酸之态，女生更多装束入时。家境清寒的学生似乎为数不多。因此校风也不及南开朴素。学生的程度，一般说来，与南开不相上下。他们的英文程度优于南开的学生，中文程度则有逊色。这当然有例外。中文系的高材生顾随，颇有才华，尤工填词。我最欣赏他在《燕京周刊》发表的一阕"采桑子"："赤栏桥畔携纤手，头上春星，脚下春英。隔水楼台上下灯。栏杆倚到无言处，细味人生，事事无凭。月底西山似梦青。"

淑希兄与我商定，我在到校的第一年授"政治学概论"和"西洋政治思想"，第二年授"概论"和"中国政治思想"。"概论"本来由他自己讲授，照美国大学一般的习惯，各系的"概论"课程，例由系主任担任，以便奠定学生进修系中其余课程的基础。现在他让给我教，我极感谢他对我的信任。民国二十年夏天，我在淑希兄的办公室商谈功课时，一个新招收的一年级女生来表示愿进政治系。淑希说："你去选修萧教授的'政治学概论'，能够及格，我便让你进政治系。"

燕京教职员住宅和宿舍共有三种。一是在校园以内，"燕东园"

和“燕南园”新建的西式住宅；二是“朗润园”里前清建造的中式房屋；三是学校购置或租赁，散在学校附近的民房。第一种的“洋味”最足；第二种的环境最美；第三种最方便。“朗润园”里适宜住家眷的房屋不多，都已住满。仅“燕东园”和“成府村”里各有空房一处。我们选了后者，于是便在成府书铺胡同三号住着。这是所建筑坚固而格局开敞的两进住宅。史密斯教授一家住前进，我们一家住后进。我们这一进的正房坐北面南，一排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当中有一个约四丈见方的院子。此外还有浴室、厨房、男仆卧室各一间。我们一家大小四口，加上男、女仆各一人，住在里面，绰有余地。我把西边的厢房用作书斋。窗外古藤一架，西府海棠两株，把这三间小屋点缀成读书的胜地。学校早已装设了电话、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等设备。这样一来，我们的寓所便有“中体西用”的妙处。我去上课，由校园的侧门进去，走过顾随词中所说的“赤栏桥”，沿着“未名湖”岸，面对西山的远影缓步前进，二十多分钟可以走到教室。有时因事，晚间赴校，走过“未名湖”便可以看见“隔水楼台上下灯”的景色。

燕京的教职员几乎每星期都有“联欢”性质的各种聚会。内子素不喜交际，我想尽量利用时间去看书，也怕应酬。我们万不得已才去参加这些活动。但我们并不闭门索居，也有一些互相来往的朋友，其中见面最多的是任宗济兄，他是清华学校辛酉级的同学，我们在清华肄业时已经相识。他现在燕京经济系任教。我们从沈阳到了北平，一时尚不能迁入燕京大学的教员住宅，只好在城内暂时住下。碰巧他受了清华同学会的委托，经管城内骑河楼的会所。承他照拂，让我们在会所的宿舍里租房栖身。环境既佳，租价又廉，我们一家受惠不小。到我移住书铺胡同之后，他时来看望我们，我也抽空到他的“朗润园”寓所去看他。每到周末，如果他没有应酬，我便约他过来便饭长谈。法律系教授郭云观先生也是和我时常见面的朋友。他曾历任法院推事、庭长，退而讲学，不但法学深湛，而且见解明通。读好书是开卷有益，与他接谈可以说是闻声有益。偶然兴到，他也走笔作诗，时有清逸隽妙之句。“一事年来差可意，借人庭院看西山”便是一例。

淑希兄与我见面的时候很多。但他是一个忙人。除了授课以外，他还要从事著作，指导学生，主持系务，出席校院各项会议，因此我们闲谈的机会较少。我们在燕京的交游不广，但并未闭门谢客。

我在燕京本有久留的意思。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中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浦薛凤兄约我去任教。逖生是老友，清华是母校，图书设备远胜燕京，学术水准也较燕京为高。叔玉、廷黻、继侗、刘崇乐诸兄都在清华。我当然不愿放过这个任教母校的机会。但燕京下学年的聘书已经送到。淑希兄正休假在国外考察，我无法跟他商量。任宗济兄劝我就聘清华。代理政治系主任客座教授柯先生坦白而诚恳地对我说："为系里着想，我不愿让你离去，为你本身着想，清华的邀请确是值得考虑的。"当我尚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法学院长陈先生派人到教员休息室来请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下课之后，准时前去，鹄候了半个多钟点，才见着他。他说："我们的聘书已经发出，你不能他就。"我问他："教员接着学校的聘书，是否可以考虑受聘与否？"他答复我说："可以的。他们不愿受聘，学校并不勉强他们。"我说："既然如此，我只有退还燕京的聘书了。"事后我把这一次对话报告给宗济兄，他说："这毫不怪。政治（徐）和经济（陈）两系之间历来很有误会。"

秋初淑希兄回校，我去看他，说明脱离燕京的原因，并请他原谅。中日战起，他放弃教学生活，服务于外交界，历任驻外使节，把他的专门学识贡献给政府。燕京迁往成都，政治系主任兼法学院长改由吴其玉先生担任。他约我回校任教，直到战事结束，学校迁回北平为止。

清华五年

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起，到二十六年七月止，我在清华大学任教五年。我感谢浦薛凤兄给我机会在学术空气浓厚、图书设备丰富的环境中，加紧努力于教学相长的工作，加速推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计划。

那时候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阵容"颇为整齐。在我到校以前，

系里有四位教授：浦薛凤（政治学，政治思想）、张奚若（西洋政治思想）、钱端升（各国政府）、王化成（国际公法，国际政治）。我到校之后，薛凤让我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当代西洋政治思想。陈之迈兄不久来校讲授中国政府，并于端升移讲中央大学之后，接着讲授各国政府。

我每星期授课六小时，有充分的时间去从事研究。我授当代西洋政治思想的办法是这样的：每一学生除了到堂听讲，期终应考外，必须阅看我所指定和他们自己搜寻到的参考书，并须在学年终了以前，就研读所得，作一篇专题报告。我极力鼓励他们在教室里提出问题，以便大家讨论。但他们多“三缄其口”，很少发言。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方式大致与此相同。为便利学生作进一步的研讨，我从许多旧籍里摘选有关的资料，交人抄出，印成“讲义”，随堂发给他们；同时，我选择若干重要的原书，列为指定参考书。可惜抄录和排印的进度都颇迟缓。清代的资料，抄写未竟，“七·七事变”起，无法继续完成。所幸已经印成从先秦到明末总共一千四百多面的资料，我存留了一份，给我后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撰写带来不少方便。

清华学生阅读和思想的能力都不弱。他们肯用功，不只是因为想得“积分”，而是对学术发生了兴趣。这可以从他们年终交来的研读报告看出。他们多能把握各自选定题目的重心，根据阅读参考书的心得，写成论证中肯，条理分明的文字。这些报告，我评阅之后，全数发还他们，以备他们自己日后参考。我事先对学生说：作研读报告的意义，不在“应付功令”，而在培养研讨的能力和取得写作的经验。选择专题应当以本人的兴趣为标准。撰写报告应当以写成的文字有日后参考价值为目的。换句话说，现在写一篇报告，实际上是在自己治学的初基上安放一撮泥土，一块砖石，这样才不至于虚费时间，徒耗心力。因此你们的报告，我仔细看过之后都交还你们。做得好，你们自己受用；作得不好，你们自己吃亏。“分数”的多少，“等级”的高下，不过是一时得失，没有长远的意义。学生们显然赞成我这主张。他们交来的报告都不是敷衍塞责的作品。例如中国政治思想史班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